

## 《史记》文体的文学史思考<sup>〔\*〕</sup>

○ 潘定武

(黄山学院 文学院,安徽 黄山 245041)

〔摘要〕《史记》文体影响后世史学和文学均极深远。从文学史角度考察,《史记》纪传体广泛吸收前代各类文体之长,又对后世诸体文学产生深远影响。但先秦即已产生传记、小说等诸多文体,故认为诸多文体源于《史记》或主要受《史记》影响,或不尽符合文学史实际。《史记》文体成就虽高,但并非臻于完美或成熟。正确认识《史记》文体的文学史地位,有助于客观评价《史记》价值。

〔关键词〕《史记》;文体;文学史地位

司马迁所创纪传体,是《史记》不朽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,郑樵称:“百代而下,史官不能易其法,学者不能舍其书。”<sup>〔1〕</sup>赵翼论曰:“自此例一定,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,信史家之极则也。”<sup>〔2〕</sup>白寿彝先生则谓:“司马迁综合过去史体创立的纪传体裁,是他在历史体裁上‘成一家之言’的地方。”<sup>〔3〕</sup>《史记》文体影响于后世史学和文学均极深远,故不论从史学史还是文学史角度,都有深入思考的必要。

—

《史记》诞生于西汉武帝盛世,无愧大汉精神的象征,用李长之先生的话来说:“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,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。‘天人之际’‘古今之变’‘一家之言’,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,征服一切的力量。武帝是亚历山大,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。”<sup>〔4〕</sup>《史记》代表了一种巨大创新,这种创新首先即体现于其文

---

作者简介:潘定武(1967—),文学博士,黄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徽学。

〔\*〕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“文章学视野下的《史记》研究”(12YJAZH097)阶段性成果。

体上。文体有常、体制为先,文莫先于辨体,这是中国古代普遍的著述意识。史体之于史著,意义尤为重大,在于其为史才、史学、史识的综合体现。中国传统文体“兼有作品的具体形式与抽象本体之意,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结合;既有体裁或文体类别之义,又有体性、体貌之义”。<sup>[5]</sup>故中国传统文体乃是著述鲜活的生命形式,与作者思想品格、才学心性均有密切关系,而非单纯的文章类别。《史记》文体创新,体现了司马迁综合百家、独立思考、独立判断与绝大勇气。太史公审时度势,解构前代史体,更能重构史体,自出机杼,创造了功能全面的五体,树后世正史之标的,亦开后世专史之先河。然历代推崇其史体的同时,也不乏批评之词,或诚因经始著述之不易,初生之事物,总是不够完美。

《史记》思想内容体现整合前代的集成意义,其文体上扬弃前代,面貌一新,故白寿彝先生称其史体亦“成一家之言”,因司马迁本欲著整合前代、超越前贤之史,深知史体与表达其“一家之言”宗旨关系极大,故其“天赋所要认识的不是一般的价值,而是特别能够认识甲、乙或丙等物质材料中所体现出来的、与潜藏在其中的(对他来说的)价值”。<sup>[6]</sup>

长期以来,《史记》也被视为一部文学经典。明清以降,尤其是现代以来,《史记》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倍受重视,明陈继儒即称:“今学士大夫腹笥笔吻,无适而非太史公。”<sup>[7]</sup>张新科先生说:“《史记》集先秦散文之大成,……并被后代散文家推为学习的光辉典范。”<sup>[8]</sup>并从《史记》对中国古典传记、古典小说、抒情文学、古典悲剧、浪漫主义文学乃至民间文学等诸方面论述《史记》对后世文学的全面深入影响。

然而,《史记》本非一部文学著作,一是西汉尚处于文史不分的历史时期,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;二是司马迁有其崇高的著述宗旨,其创作激情和艺术天分始终被其对历史深邃思考的巨大理性所束控。理解《史记》之文学性和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,必须把握两个方面:一是《史记》的文学与史学本不可分割,且其文学内涵无疑建立在史学基础之上;二是史学或文学其实均不能完全涵盖《史记》的全部,或曰称《史记》为史学名著、为文学名著或为史学兼文学名著均不够全面。另外,作为文学性很高的纪传体著作,《史记》被视为中国写人文学新的开端自有一定道理,但如因此而仅视其为一部文学著作,甚或夸大其小说因素而以传奇小说视之,<sup>[9]</sup>则未免忽略了《史记》的主体性质,也忽略了司马迁崇高的创作宗旨。

就散文文体看,殷商甲骨卜辞为散文的最初萌芽状态,《尚书》以典、谟、训、诰等诠释了早期记言散文的各种形态,同时也能初步展示人物精神,体现叙事散文的某些特征。以《春秋》为代表的编年体为第一种典型的历史散文文体,“编年在史学上是个大发明;这教历史系统化,并增加了它的确实性。”<sup>[10]</sup>《左传》在《春秋》基础上大大发展了编年体,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叙事写人功能。诚如刘熙载所言:“左氏叙事,纷者整之,孤者辅之,板者活之,直者婉之,俗者雅之,枯者腴之;剪裁运化之方,斯为大备。”<sup>[11]</sup>而与《左传》大约同时出现的《国语》,又以

另一种国别体的体例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国别体分国叙述历史,便于人们相对集中、全面地了解一国之事。且《国语》所记人物语言总体通俗、活泼,进一步发展了先秦记言文学,叙事写人成就也较为突出。而《竹书纪年》《逸周书》等同样对先秦散文文体发展具有不可忽视之意义。先秦晚期《战国策》难为信史,但却有集先秦叙事写人散文大成之意义。

说理散文方面,《周易》虽以言理为旨,但其说理与叙事结合,韵语与散语相间,尤其是经、传合看,其文体形式实极丰富。至于诸子各家散文,其本身经历数百年发展,包含语录体、格言体、辩对体、专论体等诸种形态。同样值得关注的是,诸子说理时多巧妙运用叙事,《庄子》《韩非》等寓言之繁富精妙更为瞩目。

虽然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有“小说十五家,千三百八十篇”,但文学史家普遍认为,先秦只是小说的孕育时期,而并未出现真正的小说。而近年整理的《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(叁)》<sup>[12]</sup>中,收有一篇题作《赤鹄之集汤之屋》之简文,记载汤射获一只赤鹄,令伊尹将之烹煮作羹,并由此引发种种故事,其“人物关系复杂”,“故事情节有起有伏”,且“语言生动”,具有“可能改写文学史家关于先秦无小说的结论”<sup>[13]</sup>的意义。又据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》中有一篇多达110余枚竹简,篇幅近3000字的《妄稽》,“记录了一个士人家庭内部因妻妾矛盾而引发的故事,情节曲折,语言生动,应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、篇幅最长的古小说”<sup>[14]</sup>。

考虑传世文献之阙佚和出土文献之不足,先秦文体之未被发现与认识者仍或有之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有谓:“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,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,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;故论文于战国,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。”<sup>[15]</sup>此言确实值得重视。

《史记》文体广泛吸收前代并勇于创新,无疑也代表了文体上的较大发展。但如前所论,散文之诸种文类乃至小说文体在先秦均已奠定,尤其是散文,先秦阶段实已发展得高度成熟,足以与先秦诗歌并峙。认为《史记》在叙事写人方面较先秦散文更加成熟可谓共识,尤其是其数十百篇纪传体文字多通篇专写一人或数人,更加集中有效地展现人物,在人物传记体方面具有空前影响力,的确毋庸置疑。但就人物传记而言,先秦之《穆天子传》《晏子春秋》及《战国策》乃至秦汉之际《燕丹子》等,或奠定传记雏形,或对传记有长足发展,如称“《史记》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史传传统,使中国古典传记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”,<sup>[16]</sup>这是合乎事实的。虽然司马迁大大开拓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境界,但称《史记》“开创了(中国)传记文学传统”,<sup>[17]</sup>或称“《史记》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始祖”,<sup>[18]</sup>似乎都未能充分关注《史记》之前中国传记文学产生发展的文学史事实。《史记》是中国传记文学的高峰,但中国传记文学并非肇始于《史记》。

在中国古典散文尤其是人物传记发展史上,《史记》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它承前启后,开拓新界,使中国传记文学成就达到空前的高度,后世也难以超越。我们推许司马迁在文体方面巨大创新的同时,也必须认识到,司马迁体现于

文体上的“一家之言”，并不是完全自我作古的无所依傍，更不是以管窥天的一孔之见，而是体现了全面吸收前贤之后的超越前贤。《史记》成为后世散文家推崇并学习的“光辉典范”，实际主要是就其传记文学而言。先秦散文丰富的体类和高度的文学成就，为司马迁、同样也为后世文学家广泛学习继承。柳宗元论文，有“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，参之《孟》《荀》以畅其支，参之《庄》《老》以肆其端，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，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，参之太史以著其洁，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”<sup>[19]</sup>之语，诚为其长期文学实践之心得。韩愈则借太学生之口述其遍览先秦典籍，含英咀华，方达其大成：“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；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；下逮《庄》《骚》，太史所录，子云、相如，同工异曲。先生之于文，可谓困其中而肆其外矣。”<sup>[20]</sup>唐代两位散文巨匠，均将《史记》与先秦、秦汉诸文并举，在转益多师中再一次承前启后，竖古文运动之大纛，中开千百年之文风。

论者论及《史记》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，多基于先秦两汉无小说、魏晋六朝小说乃至唐传奇才是我国小说早期形态的观点。因而认为“魏晋南北朝小说是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”。<sup>[21]</sup>前引清华简《赤鹄之集汤之屋》说明，小说文体在先秦或已具雏形；《逸周书》中的《太子晋》一篇，鲁迅先生即称“其说颇似小说家”，<sup>[22]</sup>而胡念贻更就《逸周书》中《太子晋》等三篇详细分析，并称：“先秦两汉并非没有小说，《王会》《太子晋》《殷祝》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都是客观存在，我们应当承认它，认真地研究它。”<sup>[23]</sup>另一方面，小说之诸多特质已普遍蕴含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诸史之中，也是文学史之常识。所谓虚构情节，传神写照，草蛇灰线等小说技法，不仅见于《史记》，先秦诸史实已不少概见。《史记》因其写人更精彩，手法更丰富，故对古典小说影响之大是无可忽视的，但论及中国小说之渊源，实非来自《史记》；论及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力，先秦以来诸多文史著作亦恐不在《史记》之下。

至于抒情与浪漫文学，先秦亦有丰富的创作和瞩目的成就。从《诗经》到《楚辞》，抒情诗歌由写实而趋浪漫；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的是，诸子散文中的《庄子》，其情韵独特，玄幻迷离，烂漫如诗。《庄》《骚》堪称联璧。“名理孕异梦，秀句镌春心。庄骚两灵魂，盘踞肝肠深。”（龚自珍《自春徂秋，偶有所触》其三）可见其对中国浪漫文学久远之辐射力。《史记》正是颇受《庄》《骚》影响，尤其是深得楚辞遗韵，故能获得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的美誉。当然，《史记》理想化以至浪漫化、传奇化的写人，对后世传记文学确具有诸多启迪。

## 二

朱东润《史记考索》论曰：“尚论古书，课其条例，抑扬迭作，其病有三。或本无是例，强为代立，倘有蹉跌，横肆讥诃，此强人以就我之病一也。或见后起之书，别定新例，追论古作，诋其未合，此强前人以就后人之病二也。又古人述作，但宏大体，至于枝叶，实未尽合，而即斑论豹，岂曰能贤，此强古人之阔略以就今

人之文网,其病三也。三病既明,而后《史记》之条例,可得言矣。”<sup>[24]</sup>这无疑表明,《史记》开创之史学体例屡受后世批评。与《史记》文体在史学方面不乏微词不同,对《史记》文体在文学史方面的意义,后世一致褒扬有加。《史记》文体的文学影响方面,尤表现于写人、叙事诸文体及其文学风格。

就《史记》对后世散文产生影响的文体而言,无疑是其人事结合且多以人为主的本纪、世家和列传三体,尤其是列传。纪传三体有继承前人的成分,更为司马迁的创造。司马迁创本纪以系历代帝王,演王迹兴衰,而又不尽遵循,著入了《秦本纪》《项羽本纪》和《吕太后本纪》,显示循名责实态度和高下在心的从容。本纪体例写法则吸取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之长,总体详于《春秋》略于《左传》,以粗线条囊括三千年历史大势,而又不乏精雕细刻之处。世家一体,《太史公自序》谓:“二十八宿环北辰,三十辐共一毂,运行无穷,辅拂股肱之臣配焉,忠信行道,以奉主上,作三十世家。”三十世家,或以诸侯国事为主,或以重要人物为中心,写法不一,因篇而异。立足于国,放眼于天下,一方面以一国之兴坏窥天下盛衰之道,另一方面更以家国一体的方式反映作者大一统的历史观念。孔子、陈涉二世家最为关注:孔子垂统纪于万世,堪称忠信行道之典范;陈涉为大汉有天下之先驱,视之为汉辅拂股肱之臣,司马迁入二人于世家,均正相宜。列传广传有功名于天下之士,其人类别不一,其功性质各异,其德与不德、才与不才亦有差。史公或以单传,或以合传,或以类传,合则相映成趣,类则犹如群雕。要之,《史记》纪传在司马迁可谓规模自创,既有法度而又从心所欲。然既为初创,其偶一疏漏则在所难免。而自文学史观之,《史记》之散文体例也并非成熟完美。

诚然,司马迁虽处于文学观念未萌的历史时期,然以其绝大才气驾驭历史材料,谱写历史人物,尤善运用详略互见等技法,使其人物传记既具有历史的厚度,“保证了传主生平事迹的真实可靠,又为人物形象的典型化提供了方便”,<sup>[25]</sup>多数学者认为,《史记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,最直接的就是散文。《史记》的确成为后世散文尤其是传记散文的一种典范,自韩、柳至宋元明清历代散文家,散文章法每每化用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之文雄肆,笔法纵横不羁,此即章学诚所谓迁史“圆神”(《文史通义·书教下》)之一端。然过于放纵任性,则有章法不够严谨之处,班固撰《汉书》,屡屡有纠正《史记》疏失之处,不仅显示了史法的谨严,也遵循了散文的法度。章学诚以为,性情、功力须相兼,“圆神”“智方”须有机结合,不可偏废,可谓持平之论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散文可谓各有所长,后世散文家正多能斟酌损益,并取于二家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史记》传记语言总体极具风神,但其改造经史百家文字有时也稍逊原文。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:“(南容)三复白圭之玷,(孔子)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《论语·先进》则曰:“南容三复白圭,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“白圭”一语则出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:“白圭之玷,尚可磨也;斯言之玷,不可为也。”相形之下,《史记》略显词费意尽。又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载:“于是左右既前杀轲,秦王不怡者良久。”《战国策·燕策三》则曰:“左右既前斩荆轲,秦王

目眩良久。”相形之下,《史记》又似失传神阿堵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,南朝著名诗文总集《文选》收录了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晋纪》《宋书》等史著赞论 13 篇,而于《史记》赞论则一篇不取,这无疑体现了萧统等人文学观念和其对《史记》的认识。萧统主张文学须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,单就散文艺术而言,要以语言华美、风格典丽为其突出之特色。文采之美是《文选》时代的首要取文标准,这不仅是汉魏以下渐重词采的文学大势所趋,而且也是文学自觉与成熟的标志。《史记》之文固然极其生动传神,但其过于不拘一格而或失矩矱,过于疏放而或失细腻,过于质朴而或失雅懿。要之,《史记》之文如黄河龙门,恣肆腾跃,束缚不住,而未免稍欠精密与成熟。自散文史观,《史记》天姿勃发,达到了西汉散文的巅峰,并散发着“永久的魅力”,甚至可以说,因司马迁的时代及其独特气质与人生经历,造就了《史记》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巧妙融合,使其在正史中独具诗意化和浪漫化,《史记》作为历史散文可谓是无法重复的。《史记》产生于一个思想相对宽松的盛世,这样的时代背景无疑是独特的,后世也有所谓盛世,但再也没有相对宽松的思想氛围,而思想活跃时期又必出现在混乱的衰世。其次,司马迁独特的人生阅历与创作心态也不可重复。正因为《史记》不可简单地被复制,后世散文必须因时顺势,新其面目。汉魏而下,散文文体正沿着“踵事增华”和“文理明著”的道路,文彩日浓且理致渐密。六朝散文更臻精致、纯熟,当然,因南朝后期精致有余而偏离文质兼美之正途,终被唐代古文家所革新,又正显示了文学史的螺旋上升规律。

自《春秋》《左传》至《史记》,画出了中国历史叙述不断发展成熟的轨迹。中国历史文化和历史叙述的高度发达,且更加发达的是《春秋》奠定的理性叙事,强势排挤了上古神话的浪漫与虚构。中国上古并无古希腊神话、荷马史诗那样体系庞大的神话和宏大的史诗,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。然而,历史叙述虽在孔子式的绝对理性下屏蔽了神话或改造了神话,但上古文献的不足征和历史叙述本身的缺陷都必须弥补。一方面,“史家追叙真人实事,每须遥体人情,悬想事势,设身局中,潜心腔内,忖之度之,以揣以摩,庶几入情合理。”<sup>[26]</sup>此即史家“设身处地、代作喉舌”之必要。另一方面,史家钻研史料,每为好奇心所牵引,虽有巨大理性而有时仍束缚不住。故自《左传》至《史记》,均有明显的“好奇”倾向。《左传》不但颇为好奇,而且对鬼神怪诞之事特多留意。晋代范宁批评《左传》“其失也巫”,<sup>[27]</sup>并非妄论。秉持史家的理性与责任,司马迁排斥了大量“不雅驯”的材料,但爱奇的性格与激情所驱,使《史记》不但钟情于奇人奇事,而且也时有夸饰乃至怪异内容的载录。如《高祖本纪》关于刘邦的种种异相异事的描绘,自来颇受争议。自《史记》而下,发展至《三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,进一步衷情于怪诞夸饰的内容,后者尤甚,又为后来史著如《晋书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等所效尤。史著之奇诞内容,或能增加其文学性,但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史著的严谨性,而且对后世传记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一是后世传记多传奇人奇事,二是传记的传奇笔法往往明显,乃至传记与小说面貌有时犹如孪生兄弟,难以判别

区分。

然而,《史记》是一部体大思精的严肃史著,这就决定了司马迁的好奇犹如“戴着镣铐跳舞”。金圣叹批《水浒》曾曰:“某尝道《水浒》胜似《史记》,人都不肯信,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。其实《史记》是以文运事,《水浒》是因文生事。以文运事,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,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。虽是史公高才,也毕竟是吃苦事。因文生事即不然,只是顺着笔性去,削高补低都由我。”<sup>[28]</sup>著史只能“以文运事”,“虽是史公高才,也毕竟是吃苦事”,的确是颇能体味司马迁甘苦之言。不得不说的是,司马迁之好奇与理性有时仍难免产生矛盾,致使其记史前后牴牾。如《吕不韦列传》前载吕不韦使邯郸舞伎有身而献给子楚(即秦庄襄王,秦始皇嬴政之父),诞下嬴政,而稍后则说:“子楚夫人,赵豪家女也。”或即昭示前说为传闻不足信,实际恰煽起千古疑惑,致好事者对秦始皇身世“探索”不已。对司马迁之好奇,第一个予以关注且提出批评的是西汉晚期著名学者扬雄,其《法言》曰:“多爱不忍,子长也。仲尼多爱,爱义也;子长多爱,爱奇也。”<sup>[29]</sup>扬雄对子长爱奇之评,语意略同刘勰“爱奇反经”<sup>[30]</sup>之论,显然未予首肯。而后世对史公好奇,则屡加肯定,现代以来,更多推许,是乃出于彰显《史记》文学性的目的。推崇和发掘《史记》文学性大有必要,但为彰显《史记》文学史地位而忽略《史记》本来文体及其性质,实则可能有损《史记》之价值。

徐复观先生认为,文体是一个作品均调统一的表征,又是作者与读者互相交通的桥梁。<sup>[31]</sup>伟大作家不但是伟大作品的创造者,往往也是文体创新者或集成者。屈原之于骚体,史迁之于纪传,陶潜之于田园诗,李白之于古诗,杜甫之于律诗,均是如此。伟大的作品不但文质调谐兼美,而且多包孕伟大的人格,文品、人品高度统一,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作者与读者的沟通交流。《史记》如椽巨笔实自司马迁奇崛人生和浩荡胸襟化出,惟其如此,方能成文章之巨制,立文章之义法,沾溉百世文坛。王国维有论:“无高尚伟大之人格,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,殆未之有也。”<sup>[32]</sup>朗吉弩斯则言:“伟大的语言只有伟大的人才说得出口,崇高风格是伟大心灵的回声。”<sup>[33]</sup>中西哲人所见略同。

纵观中国文体发展史,其本身是一个文体不断分化又不断融合的过程。然文体之真正革新,多具承前启后之功,诚所谓“不能新变,无以代雄”。就历史文学而言,《史记》最能承前启后。司马迁吸纳百家众体,创造出以纪传体为中心,五体依存、体系严密的全新史体,并对后世各体文学产生不同影响,《史记》本身的文体又在不断被改造、被发展着。《史记》的文学史尤其是文体学意义可谓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史的一个浓缩,只是我们不必主观高置《史记》的文体学地位,而需要尽量客观地体认《史记》文体在文学史上的价值。

#### 注释:

[1] 郑樵:《通志·总序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7年,第1页。

[2] 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一,王树民:《廿二史札记校证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,第2-3页。

- [3] 白寿彝:《史学遗产六讲》附《史记新论》,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04年,第201页。
- [4] 李长之: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4年,第18页。
- [5] 吴承学:《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1年,第3页。
- [6] 阿诺·里德:《艺术作品》,张德兴主编:《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》(第一卷)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66页。
- [7] 陈继儒:《史记定本序》,明黄嘉惠刻本《史记》。
- [8] 张新科:《史记与中国文学》,西安: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5年,第22页。
- [9] 如唐兰先生认为,司马迁是把“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的事迹,推到前四世末;把张仪、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、张仪……他的《苏秦传》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”。(唐兰:《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——长沙马王堆〈战国纵横家书〉》,《战国纵横家书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76年,第127页。)
- [10] 朱自清:《经典常谈·春秋三传第六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0年,第43页。
- [11] 刘熙载:《艺概·文概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,第1-2页。
- [12]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(叁)》,上海:中西书局,2012年。
- [13] 黄德宽:《清华简〈赤鹄之集汤之屋〉与先秦‘小说’——略说清华简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》,《复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13年第4期。
- [14] 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情况简介》,《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工作简报》2009年第1期。
- [15] 叶瑛:《文史通义校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60页。
- [16] 张新科:《史记与中国文学》,西安: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5年,第57页。
- [17] 傅刚:《〈史记〉与中国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》,《复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11年第5期。
- [18] 施丁:《〈史记〉传记文学的特点》,《荆楚理工学院学报》2011年第3期。
- [19] 柳宗元: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,《柳宗元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9年,第873页。
- [20] 韩愈:《进学解》,马其昶校注: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年,第26页。
- [21] 安平秋等:《史记通论》,北京:华文出版社,2005年,第416页。
- [22] 鲁迅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15页。
- [23] 胡念贻:《〈逸周书〉中的三篇小说》,《文学遗产》1981年第2期。
- [24] 朱东润:《史记考索·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6年,第10页。
- [25] 刘松来:《关于司马迁历史散文成就的思考》,《文学遗产》1987年第4期。
- [26] 钱锺书:《管锥编·左传正义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166页。
- [27] 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361页。
- [28] 金圣叹:《金圣叹全集(三)》,陆林整理,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8年,第29-30页。
- [29] 王荣宝:《法言义疏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7年,第507页。
- [30] 范文澜:《文心雕龙注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8年,第284页。
- [31] 徐复观:《中国文学精神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6年,第147页。
- [32] 王国维:《文学小言》,《王国维论学集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7年,第312页。
- [33] 朗吉弩斯:《论崇高》,朱光潜:《西方美学史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9年,第110页。

[责任编辑:黎虹]